

现代汉语的百年演变

王光明



王光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I207.22/237



王光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的百年演变

王光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王光明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9

ISBN 7 - 202 - 03248 - 1

I. 现… II. 王…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925 号

书 名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著 者	王光明

封面题签	欧阳中石
责任编辑	王 静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王 亚 丽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3.5		
字 数	542 000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7 - 202 - 03248 - 1/I·62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坚守这一角沉着冷静的寂寞

□谢 冕

王光明处世做人的特点是执著坚定，做学问就更是如此。从80年代他来到北大开始，我就发现了他这一特点。他做学问让人放心。他从不急功近利，更不会偷懒取巧，认定了一点，他就一心一意地向前做去。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找你讨论，他若不找你，就说明他正在那里心无旁骛地做着，你尽可等着他来交卷好了。那时他在做散文诗这个研究。散文诗在文学各品种中是很不起眼的，是一个受冷落的课题。当年改革开放，许多人都奔着新潮的或是时兴的题目去了，但王光明不管它，他认定了散文诗这一点，一下子扎了进去，结果做出了成绩，出了几本书。后来我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一些工作，临到写“散文诗”这个条目的作者时，想来想去，还是选了当时远在福建、而且似乎还不怎么出名的王光明来做。

王光明的学术专业是文学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举凡女性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诸领域也多有涉及。这些年，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领域较前有了大的拓展，但最专注、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新诗的研究。在中国新诗的研究方面，

无论是史，是论，还是诗人个案研究，数十年来，真是文案如山，华章似海，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其中不乏前辈学者及当今名家的精心著述。选择这个题目，无疑要承担诸多风险。要么跟在前人背后，拾人牙慧；要么不求有新的发展，陈陈相因，用老办法来写老文章。而这种庸常状态的“学问”又有什么意义？而要有所创立，则无异乎要有超强的毅力作后来居上的冲刺。这对于一般学人，均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选择。

从当前已有的此类论著来看，一般性的著述仍然居多，而能够彰显个性的立论还是少数。所谓一般性的著述，就新诗史而言，最常见的写法是把迄今为止新诗发展的已有资料进行各式的组装，或者按照流派或“主义”表面化地划分若干思潮，再把各类诗人分类归入。另一种就是把新诗的发展时间，作一些阶段性的切割，再把这个时段的诗人有关的生平作品嵌入其中，等等。这些工作，间或也有精彩的言说，但大抵也多是属于重复劳作一类。我研究新诗的年头也算是不短了，每当想到这些难点，总还是有些犯怵而不敢轻易为之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王光明，他在80年代从散文诗这个小小的门类打了一个“硬”仗之后，经过一段认真的思考和准备，终于“挥师”指向了一个崭新的“阵地”。

这次他盯住的是中国新诗。也像往常一样，一旦他顽强地盯住一点，他就会像铆钉一样地咬住而绝不放松。王光明如今这番举动，是死盯住新诗的“新”字做文章。他翻出了新诗的“老谱”，从近代“诗界革命”的“新派诗”、“新意境”、“新语句”开始，对其中的“新”意进行寻根刨底的考问。再到胡适的白话诗试验，直至1919年《谈新诗》一文的发表，他都有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自从新诗革命宣告成功，其间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

路。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把中国新文学革命的诗歌这一文类的试验定名为“新诗”。王光明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定名”开始的。他怀疑这种命名的真理性，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他把隐藏在这一词语背后的东西找出来，剖析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它的工作是从找它的“问题”开始的。他质疑“新诗”这一理念，他认为胡适的定名“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他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来代替它。

一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就锲而不舍地往深里钻，以他长期积存的历史、哲学、美学知识，调动他所掌握的全部资料，从他人的推理和结论中，也从自己的思考 and 实践中，深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探求合理的解释。这时的工作好比是一台千米的钻探机，一往无前地往地心里钻，不触及那核心就不停钻。这是做学问的一番境界，许多学问家正是在这样艰难探险的路上炼成正果的。

近年学界浮躁之风甚炽，报端对此多有披露。有些人、有些事发生了，都远在情理之外。这话说的人多了，这里不说也罢。探究这风气的发生，归咎于时代或归咎于体制，固有其理。但同处一个时代或同属一个体制，有的人如此这般，有的人并不。所以，说到底还是个人的原因。中国“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学术界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尊重个人意愿的时期。思想解放，张扬个性，是这个时代的新气象。但是，长年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的思想统治的枷锁一旦拆除，迎面而来的却是失去规范的物欲滚滚的洪流。这种风气影响了一向清静平淡的学术界。人们对做学问失去了耐心。急着出书，急着成名，急着当教授，要是套用一句老话，那就是，以中国之大，真的是“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生当此时，每每告诫自己，也告诫自己的学生，不为浮躁

之风所裹胁，要坚守这一角沉着冷静的寂寞。王光明的工作让我感到欣慰。他拒绝那种急功近利的态度。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证明。它相当全面地展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的崭新的境界，他正在以自己的执著和坚定，跋涉在前辈学人行过的充满艰险、却又默默耕耘的道路上。王光明这本书的写作是具有挑战性的，他从根本上质疑了新诗的指称。而这些指称的背后，却是定见、惯性和权威。这就是本书作者所要始终面对的事实。学问的路从来就不平坦，要是不冒任何的艰险和困难，要是不准备挑战已有的结论，那样的学问是非常可疑的。

中国新诗在它创立的过程中，业已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的成就。这无论是在当年或是在现在，应该没有分歧的。但即使是在五四初期，就已有入尖锐地批评它“为了白话而忘了诗”，或者如王光明在“导言”中说的，“怎样现代和如何文学，始终都是个问题”。就诗而言，王光明认为胡适的新诗的理念中，“强化了新旧对立的意识形态，使新内容（时代精神）和新语言（白话）成了新诗的指标”。而正是这种指标误导了诗歌，使诗质的丰富性被“时代精神”所遮蔽，使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在被白话的透明所取代，从而使诗的美学要求降到最低点，形式和语言的艺术性变得微不足道。这些判断都是“往深里刨”得到的，应该承认是溯及源头的批评。

作者强调同为汉语写作的诗歌内质的传承性和同一性，认为新诗“只能是不不断延伸的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个历史阶段”，“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实际上是一场寻求思想和言说方式的现代性运动”。他立论于以“现代汉语诗歌”这一指称来替代传统的新诗这一指称。整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都在求证这样的立论。近百年来，人们谈论新诗的诸多问题，总是充满了焦虑。本书作者则认为新诗在它的发展中面临的是一个

长期的问题，“是一个重新创造它的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进程，一串迂回探寻的脚印，一个在实践中寻求认同和修改的梦想”。他有一种从容求证的心态，他的出发点不是要“锁定”历史，而是以开放的视野提出问题。他呼唤诗的艺术自觉的觉醒。

新诗从它准备到诞生，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存在着议论和争论。这些议论和争论，随着环境的变换，也不断地变换着名称。但究其根源，大抵总是出于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外国诗歌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二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新诗的百年之痛。王光明在书中谈到，“破坏越是彻底，建设的压力就越大。资源越是丰富，体系越是开放，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求得普遍认同就更为坚苦卓绝”。可谓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我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近年来我在不少场合都说过，好诗是不分主义的。但恰恰相反，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标举旗帜，侈谈主义。有的人不了解历史，认为诗就是从他那那里开始的。这是今日诗界的顽症。我希望大家都从问题出发，多研究些问题，像王光明在这里做的那样。面对新诗，开始时我们充满焦虑，数十年过去了仍然充满焦虑。但有些事好像急了也没有用。时间照样往前走，而且愈走好像问题愈多。究其原因，大概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言，文类秩序的重建，美学趣味的养成，作者和读者阅读共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再盲目，触及了问题，把它和盘托出，即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后人来解决。

王光明治学严谨，本书多有创见。而且论述平易，不故作危言。他对史料的熟悉，使他的行文从容不迫。其中若干章节，如“现代诗的再出发”诸章，资料丰实新颖，发前人所未

未发，实属难得。此书写作经年，以百年为期，综观历史演绎，寻根究源，以启来人。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也许正是从此书的写作开始，他赢得了一种独立表达的权力。他所说的道理，他人很难反驳。他颇有一些自信，颇有一些“力排众议”的味道。也许正是因此，让我们深信一个学者的成熟。

2003年5月，京城 SARS 肆虐，于昌平北七家村

序二：

以问题穿越历史 以冷峻审视过程

□孙玉石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演变过程与探索历史，自清季黄遵宪、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肇始的时候算起，由胡适、郭沫若等一代人勇敢的尝试与创造，历经上个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末期的几代诗人的辛勤探索，搏求，探险，抗争与建设，历经无数的曲折与失败的反思，无数的纷争与坚忍的沉浮，不仅形成了与传统诗歌不同的自身的独特的艺术传统，为中国和世界诗坛贡献了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余光中、北岛、海子等这样一些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而且由于新诗自身存在的“不成熟”性和无休止的探索性，这近百年的上下求索历程，也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富有文学史意义的思考话题和言说空间。

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在这20多年里，或是以历史断代形式的，或是按照地区的，或是以思潮流派研究的形式，或是以问题质疑与探讨的姿态，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论著和学术论文，分别地作出了各自的思考与回答，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颇富启发性的见解，留给我们许多历史的评述与未来的憧憬。王光明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部专著，就是在认

真审视这些众多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关于百年新诗无论时间或空间方面，都更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超越性意义的学术专著。

8

这种超越性，吸引我的是王光明对于新诗演变过程理论思考的突进。作者在本书的“导言”里说：新诗近百年的上下求索，有何文学史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怎样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是否完成了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的重建？能否作为一个环节体现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这部专著里，隐含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却不准备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作者又说，自己本书的出发点，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经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导言”里的这些话，基本上说明了作者本书里面追求的学术意图。作者的这种努力的付诸实践，自然给本书带来了一种以问题穿越历史，以冷峻审视过程的理论思考者的新姿态和新深度。

全书贯穿的是作者的一种观察中国现代诗歌格局的大视野。因为本书不是百年诗歌发展历史的严格描述，不是诗人及诗潮的专论性文字的叠加，而是以很强的问题意识审视历史，因此作者对于历史先行者的探索足迹，对于正在发展行进中的复杂文学现象，不作简单的文学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都能够抱着一个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历史理解的心态与批判反思的精神。他能够于复杂现象中清醒地拎出带有理论色彩和学术价值的问题，充分的阐释与简洁的概括相结合，迅速地接近所论论

题或现象的本质。如就整体性来说，他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三个地区诗歌的概括说，“在当代诗歌中国的格局中，如果说大陆的诗歌创作以诗与意识形态的纠缠迎拒为特色，台湾的诗歌处于现代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张力中，那么，香港诗歌最引人注目之点，该是其城市书写与想像了。”就某一位诗人个体来说，他从一个诗人创作成就与失落的反思，说明郭小川诗当时和后来诗的悲剧造成的原因，一是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二是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三是诗歌情境的抽象化。就一种历史现象的评价标准来说，他能不囿于既成的强势舆论与实际存在的人情笼罩，坚持一抒己见的坦率直言，对于艾青 1979 年后创作及其他“归来的诗人”的诗作，认知葆有清醒，批评多于赞扬，严肃地探讨了他们回归后所陷入的“艺术困境”。就一个时代颇有纷争的重大问题，他能不掩饰，不回避，不拐弯抹角，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如 90 年代“诗歌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说，实际上，90 年代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倾向，在文化与诗歌的意义上，也是“常谈”（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更持久的生活与文化主题）与“中心”的对话。而人们对这种倾向的诸多不满与误解，也多半来自“中心”价值的长期影响，尽管它经过了 80 年代的“反思”，同时在 90 年代被置于经济橡皮擦的“擦拭”之下，但其中心性的功能，仍然习惯地以“中心”价值来判断与规范诗歌，仍然过于重视诗歌的社会承诺而不重视诗歌写作中个人感受力与想像方式的变化。他充分肯定诗歌的感受力与语言的解放给 90 年代诗歌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由一到多”的分解所产生的丰富性，也推动了不少诗人探索诗歌文本的包容性，以求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保持接纳复杂现实经验与矛盾的个人感受的开放性。全书里对于像类似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概括，分析，论述，都

能乘以学术良知，从文学史的实际出发，于平实的文字中，显出作者学术把握的敏锐与理论阐述的功力。全书的言说历史，重在把握历史“演变”中的问题，以及如何“演变”的破解，不泥于历史的梳理，或者说不溺于历史叙述，而更重于理论分析的特色，就由此而呈现出来了。王光明的熟稔现当代及港台诗歌与理论的学术专长以及沉潜思考的个性，也就因此给这部著作带来了高屋建瓴的审视，很强的理性与思辨的色彩。

10 在这部专著里，浸润着无论是对于几代的诗歌探索的先驱和后来的实践者，还是对于新诗执著的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个过分理想化了的憧憬与追求：一个辉煌的梦想，伴随着无数的教训。王光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有一个学者情怀的现实与清醒。因为怀有这个梦，因此，他过于理想化地追求一个目标，并为至今没有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而喟叹。他说，百年“新”诗的努力，虽然留下了许多闪光的脚印，却未必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这话本身，就很有讨论的余地。在新诗的开放多元发展的探索中，究竟将来有没有可能存在，会不会形成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如千百年来为人们提供的中国古典诗歌范式与境界那样？我以为这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甚至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但是，作者没有一味地去追求这个梦的实现，而是在无数“寻梦者”的多向实践所留给我们的足迹中，去努力探索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很多的篇幅，追踪和讨论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的消长起伏，现代格律诗的各种实践模式，很高地评述了陆志韦、刘梦苇、闻一多、林庚、吴兴华等人格律诗的理论实绩，甚至对于吴兴华的个人诗歌探索，对于现代格律诗探索与成绩本身，都流露出更多感情的偏

爱，而对于自由诗的一些理论阐释，则似乎颇为看轻。如将胡适的“作诗须如作文”的主张，与废名的“自由诗的文字是散文的”，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等有深度思考具有真理性价值的理论，混同在一起，带着一种“深刻的片面”的情绪，轻易地加以否定了。然而，与这一回归传统的梦在深层上相联系的，对于另一个方面问题的思考，却更能体现出王光明在书中这种“百年寻梦”的理论情怀。这就是他对于现代诗歌与传统联系的深度思考。百年新诗“演变”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作者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修复新诗与传统诗的断裂，寻找自身传统的资源，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就已经被提起的话题。废名等现代派诗人倡导和阐释的“晚唐诗热”，他肯定了林庚的诗给新诗送来了一份“晚唐的美丽”，这些思考的背后，就是呼唤和认知传统中的现代性因素，努力寻求实现新诗现代性的本质，构建一种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接轨的深层形态。到了90年代，这种思考已经被提到一个新的视界。

王光明在书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的思考过程，特别注意论述了郑敏先生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所作的深刻的思考和系统论析。书里介绍了郑敏在90年代以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语言观念必须革新》等，阐释了这些论文里提出的20世纪汉语经历的三次转变、汉语的文化审美特性及其与诗的关系、古典诗与现代诗三个方面的问题。作者吸收郑敏及其他人的意见，将在诗歌里70年来一直处于被压抑地位的汉语语言，从工具论的地位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进行认识和讨论。他引述郑敏的话论述说，新诗写作应该深入挖掘汉语繁富丰美的文化内蕴。这样，21世纪的现代汉诗，

才能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关于古典诗与现代汉诗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是把郑敏对新诗母语的体认，在诗歌的具体领域作了进一步延展。郑敏认为：“继朦胧诗后，中国当代新诗创作陷入一种突破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诗歌创作模式的困境”，走出这个困境，诗人们“需要重新发现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诗歌传统（从古典到今天），使古典与现代接轨”，“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置，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诗歌创新的灵感。”

12 （《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王光明提出，虽然郑敏对于诗歌传统与现代的见解，还需要更具体细致的梳理与讨论。但是她的这种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本体精神建构问题的“自觉意识”，对于新诗未来的发展，却是非常重要的。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诗歌问题的深入自我反思，只有深入到语言形式的范畴的时候，才是建设性的。”作者“百年寻梦”情怀的理论清醒与敏锐锋芒，在这些论述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部专著对于新诗演变中最核心性话题的深入突进之一，也许就在这里了。

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两者之间，有某种同一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历史真实是由特定背景下所进行的一些人物事件构成的真实的存在。历史叙述则是当代或后来者从自己的观念与原则出发，对于历史真实的一种主观描述和阐释。因为带有主观性与不同的选择取舍，后来者的任何历史描述，因此也就都带有了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色彩与价值判断。历史研究中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但历史过程现象的真实与否，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有无轻重，总该是不能靠主观来任意判定或扭曲的。不然，顾颉刚的皇皇大作《古史辨》，就根本不必要写了。即使写了，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不朽的价值。日本右翼分子编造的否

认南京大屠杀的神话，也就不必要跟他去认真说法了。但是，在历史叙述中，即使是以相对的客观为尺度，来要求于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属于接近自己生存时代的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也有不同。就接近历史真实的程度而论，可以粗略分为史述，史论，史臆三个层次。“史述”在近于“信史”追求中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史论”在研究者的意图选择中更多一些主观色彩，“史臆”是为了某种功利意图对于历史“故事”的戏说和臆造。在学术性和回忆性的历史叙述文字中，前两者属于不同研究姿态的选择，都还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近些年泛滥于各种传媒的最后一种“史臆”，则完全丧失了尊重历史真实的学术风范或科学品格。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在《董小宛考》这篇杰出的论文中，对于一些小说“倒乱史事”的倾向，曾作了这样的批评：“凡作小说，辟空结撰可以，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凿其间，世间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事实，只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得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不可不辨也。”（《心史丛刊（外一种）》，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由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文类的差异，某些属于大众性通俗性创作中，出现戏说或臆造历史的种种现象，本来是常见的事情，不必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也不必把它当信史去看待。但是，只要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回忆性质的文字，就不能带有臆造或“戏说”的成分。然而当下的事实是，孟森所批评的这种“对历史肆无忌惮”、“以流言掩事实”的“事关公德”的荒谬文笔，不仅在小说，在电视剧，即在“戏说”当代人文真实史迹，在“戏说”臆造性的“回忆”文字中，为求得某种轰动效应，却比比皆是。甚至在一些历史学术研究中，也是存在

的。我谈这些似乎是题外话，是有感一些历史研究、历史文学、历史回忆的流弊，借题发挥，也是在大体区分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处理关系的不同层面，以呼应对于王光明这部书的历史品格一种学术定位肯定性思考的需要。

14 这本论述中国诗歌百年演变的书，我以为是属于“史论”性质的一部专著。它不是百年诗史，却有百年诗史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它尊重历史真实，又不拘泥严格史述研究的框束。没有像一般文学史、诗歌史那样，分斤论两地去评价介绍一些诗人的成就得失。重要的诗人生平及创作成就史料，重要的诗歌流派与诗歌现象必要的史实，书中多用注解的方法处理，以尽量地淡化正统诗歌史写作中史述的范式与色彩，减少以论述为主的正文承受过多史料的压力。本书努力追求的特色，是用自己考察新诗百年演变的理论问题作为全书的主线，将与之相关的主要诗人、诗潮、诗歌流派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诗歌现象，一一串联起来，以研究重要问题为中心，专章专节历史递进地对于历史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与论述。为了说明问题，他读了很多的书，引述了很多史料，作了详细的历史大事年表，也对于一些过去被遗忘或淡漠已久的史料作了系统的发掘、梳理与论析，如40年代活跃于北京诗坛的诗人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及其对于现代格律诗的探索，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的意义关注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当然，基于这样的“史论”研究姿态选择的问题意识，历史叙述观念、行文和策略的需要，在这本书里，有的时候，往往历史中的某些部分被放大了，某些部分被缩小了；某些评鹭过于贬抑，某些评鹭又过于夸饰，这种放大与缩小，贬抑与夸饰，是对于一些历史图景的一种选择需要或偏爱，还是历史认知和主观书写中的某种误读？我认为这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作者重在新诗演变过程，不重在